

扮戏也是做人 细节决定成败

“老戏骨”李滨忆北京人艺前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的艺术创作



▲李滨在讲座现场。摄影：实习生徐晓惠

前一站下了车。“我跑到灯市口的稻香村去买槽子糕(鸡蛋糕)去了,为什么,当年在人艺舞台上那可都是真吃啊。”

李滨记得很清楚,为了表演的真实性,仅一个吃烤窝头片的细节,道具就一改再改。1951年,人艺排原创大戏《龙须沟》,舞台上,焦菊隐先生要求演员们边吃边拌嘴。一次次的试戏,于是窝头片变成

馒头片,直到最后变成槽子糕片,“窝头片太硬,拉嗓子,一边说话一边吃窝头片容易卡着。馒头片颜色太白,舞台效果不真实,哎,只有这槽子糕片颜色在灯光下正好,还入口即化,真是太好了。”李滨一边解释一边从随身的包里取出刚买的槽子糕给大家演示,掰成两半的点心在明亮的灯光下还原了当年的舞台效果。

经常也会受邀参演一些电视剧的李滨,说自己总是和剧组的道具师关系最好,更喜欢跟他们开玩笑。“哪怕是嗑瓜子,我也会问,这瓜子几天了,时间长了就不能吃了,哈喇了,麻烦。”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真实的细节是必修课

“演员自己要多做功课,表演要做到心里有谱。”在回忆焦菊隐先生在编剧上的严谨态度时,李滨觉得,如今一些大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仍存在对史料准确度把握不够,甚至剧情粗制滥造的现象。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扮演何香凝的李滨回忆排戏的过程时说道:“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场大戏是毛主席在西郊机场的阅兵活动,当时我接到剧组通告要到现场。”为了演好何香凝,李滨的前期功课已经非常认真。“我一想,不对呀,何香凝当时还在香港,不可能去西郊,再查史料果然如此。阅兵是在1949年3月进行的,何香凝1949年4月才从香港到北京。”

对细节格外挑剔的李滨,更是指出了在《建国大业》中一些服装道具与史料有很大的出入。她说,电影中,宋美龄跟着蒋介石走下中山陵的一个镜头中,宋美龄旗袍下露出的浅肉色丝袜与时代不符。“那是1948年,宋美龄应该穿浅咖啡

色的玻璃丝袜,美国舶来品。何香凝脚上的丝袜则应该换成白色线袜。”

李滨觉得影视创作者应该多学习,多反思,开机前做足“功课”,“否则会贻笑大方”。

“焦先生对舞台戏剧服装的要求是以剧中人物的塑造刻划为最终目标。”李滨说,这就要求服装设计师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中不同的人物,研究吃透剧中人物,寻找出典型的可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以及性格可视的外在特征,创造出艺术化的人物造型。

李滨回忆道,那个年代尽管物质匮乏,但服装师总想尽办法将服装在舞台上既经济又实惠地完美呈现。讲到人艺当年排前苏联话剧《带枪的人》时,为了说明苏联红军特有的长及脚踝的“军大靴”,李滨特意走到一边的白板前,给观众画出示意图来解释,“当时服装师试了很多材料都没有那种质感,不真实,怎么办?试来试去最后用麻袋片做出了那种效果,不仅成本降低了,而且在灯光下很真实,太完美了。”

导演张艺谋在拍摄《金陵十三钓》时曾找李滨帮忙,“去教教年轻演员如何穿旗袍。”李滨笑着说,到了现场才发现,“那旗袍没法教啊。”原来剧组做的旗袍是简易旗袍,拉链套头式,而且又开得很高。李滨摆着手说道,“秦淮歌女的旗袍不是那个样子。”

李滨慢慢走到白板前边画边讲,从过去妇女的穿着打扮到生活细节,为现场观众解释了旗袍的正确穿法。“现在的旗袍做法是不对的,把女性的身体穿成了花瓶。”李滨说,“影视作品服饰都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细节很重要,不能糊弄事,更不能糊弄观众。”

李滨说,演戏不是简单的宣讲,扮戏也是做人,细节决定成败。

文艺人生

本报记者强晓玲、实习生徐晓惠

“没有焦菊隐先生就没有今天的人艺。”88岁的李滨一再强调。5月13日一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个能容纳200名观众的小剧场里,座无虚席。

为纪念人艺建院65周年,北京人艺博物馆日前推出系列艺术讲座,旨在让观众在老一辈艺术家的讲述下一起重温人艺往事。

作为北京人艺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演员,李滨曾出演话剧《龙须沟》《骆驼祥子》等作品,但真正为观众熟悉,是离休后参演的系列影视作品,其中包括《甲方乙方》《我的父亲母亲》《建国大业》《梅兰芳》等电影作品,塑造的不少鲜活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著名表演艺术家、人艺“老戏骨”李滨来到观众中间,以一名见证者的视角回忆了北京人艺的前总导演焦菊隐先生艺术创作中的点滴,以及对自己在舞台艺术上的深远影响,与观众分享了戏剧大家“于细微处见真章”的精神。

大师的细微体验

中国戏剧界向有“北焦南黄”的说法,“北焦”是焦菊隐,“南黄”指黄佐临,他们被誉为“中国现代剧场艺术的开拓者”。

“焦先生学贯中西,精通英法两国语言,是中国戏剧界大师级的人物。”提及当年与焦菊隐先生一起排戏的往事,李滨一脸沉醉。焦菊隐认为继承、发展、创造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这才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话剧民族化的导演学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北京人艺首任总导演,焦菊隐指导作出《龙须沟》《虎符》《茶馆》《蔡

文姬》《武则天》等直到今天都被誉为人艺的“传统大戏”。

“创新中,他不仅善于把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手法,融入到话剧舞台当中,更是基于他广博的学识以及细心的观察,用自己的判断和生活中的各种积累于细微处见真章。”李滨说。

焦菊隐的写字台上常常同时摆放着不同种类已经翻阅一半的书籍,创作累了,随手拿起一本外文建筑学,翻翻看看,既是调剂也是思考。尽管家里有保姆,有时也会“闷头给孩子洗裤子(尿布),或是捡煤核”,“这更是一种生活体验”。

李滨说到开心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浓郁的京剧腔韵以及影视作品里那个常常倔强有理的老太太样儿,把大家逗乐了。

从窝头片到馒头片再到槽子糕片

“你们觉得现在电视剧里的演员都是怎么吃饭的?”现场,李滨很会调动大家的情绪。“对对,很多演员只见于盘里扒拉,就是不吃。即便吃,也是鸡呀米,一粒一粒的。”观众又是一阵发笑,老太太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

“现在剧组的道具饭太难吃,不能怪演员演的大假。”“为什么难吃?”“钱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提起如今电视剧中演员表演做作不真实,李滨说,除了个别演员太在意形象,或是演技的问题,“更多原因是一些‘大腕’小鲜肉拿走了整部戏剧制作费80%的片酬,其他的支出只能压缩再压缩。因此,一些影视作品粗制滥造,制作方已没法在乎演员的表演了。”

为了给观众讲解当年人艺剧务在道具准备上的细微之处,李滨除了从家里特意带来了小碗、小茶杯。早晨,在赶往人艺讲座现场的路上,她还提

子弹飞翔

王天德、秦富梁

“一颗饱浸抗日英雄陈年旧血且锈迹斑斑的子弹”,由开国中将刘飞所携,从江南水乡呼啸而来,在历史的天空划出炫目弹道后,已然蝶化为脍炙人口的红色传奇。“军旅作家高建国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因生动再现抗战传奇引起广泛关注。

有评论说,作品是对“江南抗日义勇军”(下文简称“江抗”)历史缺乏认知或了解又疑信参半者的强烈补钙,是对“战争历程和文化精神的双重书写,健在的‘江抗’老战士、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江抗’后代,对这部作品也十分认可,认为该书问世填补了全面翔实再现‘江抗’历史及英雄群体的文学空白。”

被忽略的历史隐秘角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高建国一走入驻豫原第二十集团军,便立刻发现了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的迥然不同处。部队历史与红色经典《东进序曲》《黄桥决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密切相关,纪实文学《血染的风采》、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取材于该部36个伤病员阳澄湖斗争经历。

1948年11月,刘飞在大运河畔的窑湾古镇挥师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三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时任新华社战地记者的崔左夫赶来采访,刘飞对他提出了采访36个伤病员坚守阳澄湖芦苇荡斗争事迹的设想。九年后,崔左夫赴苏南写出的这篇特写,为原二十集团军文工团团长陈荣兰意外所得,于是成为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的滥觞。

历史隐秘角,以“江抗”为代表的新一四军部队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质,令高建国不禁怦然心动。原来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不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啊!能打仗、有文化,这或许是我军若干部旅本质但却长期被忽略甚至遭曲解的一个重要特征。

高建国披阅史料得知,这支部队是保留最完整的新四军主力。1937年淞沪抗战后,上海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量青年学生、市民参加新四军,有不少高中生,手拿钢枪,兜揣钢笔。

后来,高建国到这支部队工作,深入了解部队历史和不断接触“江抗”前辈,萌生了再现这段历史的想法并着手搜集资料。

2014年10月2日,高建国来到苏州革命博物馆,伫立陈放取自刘飞胸中子弹的展柜前凝神思绪。1939年9月21日,时任“江抗”政治部主任的刘飞,率部在江阴顾山与来袭的伪军——“忠义救国军”激战,这颗子弹从敌步枪枪中射入他的肺部。

烽火远去,厮杀渐歇。高建国感到,那颗黑与红的经历参半、烙印着特殊历史而又令人憎爱交加的子弹,七十多年来从未停止过飞翔,不仅引发了红色经典创作,而且打开了透视中国共产党人战略运筹和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谱的窗口。

成书后,人们发现,那颗在广袤时空

中的困难是什么?作者沉思后回答,再现“江抗”战争传奇,一是缺少鲜活的血肉,二是莫衷一是的说法令人难辨真伪。

为了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高建国调动了三十年间自己全部生活和思想积累,运用了从原始到现代各种方法和工具。2015年,他利用节假日数次到江南查看重要战地遗址,寻访健在的老“江抗”,定向补充材料。在田野行走、实地踏勘和直访当事人、知情者的同时,他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甄别求证。

在上海,高建国来到“最后的护理员”、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护理过刘飞的卫生员、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白山家,看到了许多摄于战地的照片,为作品写入了几个感人细节。

60年前,新华社记者崔左夫为写《血染的风采》,专程采访过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施光华。时隔一个甲子,高建国再访年届九十七岁的施光华,印证了当年陈毅确定“江抗”番号的珍贵历史细节。此后,遇有涉及“江抗”的存疑史实,则请他把关。有史料载,太仓县县长郭曦晨是抗战烈士。施光华提出,全国解放后他在上海见过郭曦晨。后查明,郭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去广州工作了。

“真实是写实类作品的生命,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只有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文献性统一,才能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本着对历史负责和以信史告慰前辈的精神,高建国把求真作为创作前提。他自信,全书所有细节皆有所本,无一杜撰。

寻找《沙家浜》中沙四龙的人物原型胡小龙,是该书创作的一段佳话。高建国确信,1939年秋,在日伪妄图把新四军伤病员困死湖中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胡小龙在敌人眼皮底下悄悄下湖解缆推出小船,在水下用芦苇管呼吸托船驶进芦苇救出伤病员,东路的抗日斗争就要改写。

创作中,他通过有关部门查到现居上海奉贤区的胡小龙,籍贯、年龄与抗战中从阳澄湖东来茶馆赴上海的胡小龙吻合,经上海东新路“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终于找到了淹没民间半个多世纪的草根抗日英雄,得知其叔父、中共常熟县委地下交通站东来茶馆老板、共产党员胡广兴,因难舍双妻抗战中不得不退党带胡小龙到上海谋生,后因病去世。而胡小龙则低调存世不为人知。

那一天,高建国紧紧握着胡小龙的手,由衷说道:“真诚地感谢您和叔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新四军伤病员最困难的时候,为护佑东路地区抗日火种做出的贡献!”

“江抗”副总指挥乔信明之子、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乔晓阳,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高建国打来电话,对作品为“江抗”传神写照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对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文字,生动准确描述抗战时期内忧外患交织和变幻莫测复杂形势及危亡岁月的各色人等,表示钦佩,并代表“江抗”后人表示感谢。

七十多年的战争岁月渐行渐远,历史深处兼葭苍苍。访谈中,记者询问创作

读诗

郭慕清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堂。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显言夙驾,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騂牝三千。

——出自《诗经·鄘风·定之方中》

一个人面临困境,甚至是绝境时,会怎么办?对于诗中的卫国来说,经历了狄人一战后,几近灭国,祖宗基业毁于一旦,不得不从头再来。

在今人看来,河南的淇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隶属于鹤壁,但是在历史上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朝歌。这是商朝的都城,辉煌了600年,皇位传到商纣王时,他荒淫无道,沉迷声色,酒池肉林,被周武王端了老巢。昔日的辉煌的朝歌,这才明珠暗沉。

到了卫国时,都城也在淇县,也出了个荒唐的国君,淇水汤汤,白鹤飞舞,“动物协会”资深会员卫懿公,名叫卫赤,是卫国的第十代国君,他玩物丧志,进而丧国,最终惨死在沙场。

当时的卫国犹如一盘散沙,狄人在朝歌烧杀抢掠,蹂躏百姓,此时的朝歌可谓是人间的炼狱,卫国人无法存活,只能逃。

据说,当时逃出来的百姓只有四千多人,也有说不足千人,遥想起卫康叔时,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可“家富多败儿”,到了第十代,就已经到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境地了。

怎么办?许穆夫人,一代巾帼英雄,走过了高山,涉过了河流,一路颠簸,带来的金钱财帛,还带来齐桓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国遗老遗少,在漕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滑县,勉强复国,当时人们先推举的国君是卫戴公,不过卫戴公不堪大任,皇冠朝服压身,竟然没过多久就死了,传位给他的弟弟毁,也就是卫文公,后世人称之“中兴之君”。

以前读史书,觉得春秋战国时期,人的名字取得蛮有意思,比如,这个卫文公,名曰毁,做的却是“建”的事情。因为漕邑不宜当作都城,在他们稍微安顿一些的时候,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毁又带领卫国的遗老遗少在楚丘建立都城。

这就是这首《定之方中》讲的事。在电影《飘》中,南北战争结束后,斯嘉丽面对一片废墟的家园说,“不管怎样,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卫文公的心情诚如是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里的“定”指的是定星,北方玄武星宿,此星昏而正中,十月之交,就是农历十月亥至十一月,在这个时候可以营造宫室,故而这颗星又叫作宫室星,所以叫作“定之方中”。这时,这颗星直冲正南方的天空,“楚”在南方,所以说“作于楚宫”。

后面又讲,“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是测量的意思,古人建造房屋,立竿见影,确定方向,诗中上言“楚宫”,下言“楚室”,建造是有顺序的,按照《礼记·曲礼下》所记载,为“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阼库为次,居室为后。”

用人之道

倘若一个国家人才云集,则天下兴隆,反之亦然。一个国家对待人才、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反映在国运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运即是国运。

卫文公,就是一位求贤若渴的君主。他挽卫国于狂澜,复国中兴,国家渐渐富裕,卫国当时的发展已经超过他的国小定位。

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八荒六合,横扫诸国时,独然不灭。卫国最后一个国君,曰君角,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卫国安然无恙,一直在秦二世时,也就是“君角二十一年”,胡亥废君角为庶人,这时卫国王才彻底退下历史舞台。

秦始皇不灭卫国,秦、卫多年并立,究其原因,今人仍没有定论。季礼曾周游列国,才名卓著,在游历卫国时曾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患。”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卫文公对待人才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朝代,宋朝。尽管外敌环伺,地缘政治有些恶劣,重文轻武,军事力量暂且不表,但宋朝的文化、经济、科技发展都达到了高度繁荣的地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人才,特别是对文人的重视。

古人讲,“伴君如伴虎”,一言不慎,脑袋搬家,满门抄斩,但是这种情况,在宋朝是很难出现的,宋朝几乎没有杀害士人的记录,文字狱也是少见。

据说,宋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先祖赵匡胤在建国初年曾经秘密立下一道誓碑,规定皇室不可杀害士大夫。这种传说,首先出现在叶梦得《避暑录》中。

“爱伐琴瑟”的“伐”字,就是砍伐的意思,砍伐“椅桐梓漆”,为了造琴瑟,似乎有些奢侈,已是国破人逃亡了,还要琴瑟这些乐器,不是又会有靡靡之音呢?非也。传说,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太子官,上面有一个殿,名曰音乐殿,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里,半夜时分,腾空而去,这个故事里有一个隐喻就是当人们砍伐掉这些树,会出现天籁,无弦琴会在空中弹奏。

“琴瑟”二字,从字形上看都是“王”在上,弹奏的是王者之音,是和悦清明的象征,这里暗示了卫国王必将兴旺发达、国泰民安,再度中兴。

宫室和都城建造好了,民心初定,就要劝课农桑了,第二、三章讲的就是卫文公为了卫国人民再度过上好日子,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史记》如是记载,“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

苦心人,皇天不负,卫文公做了这一切,都有了回报,“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騂牝三千。”

“騂”是高头大马,牝是指母马,“騂牝三千”,“千乘之国”算是一个中等的诸侯国的势力了。

《定之方中》主要从国都重建、农业、军事等方面来讲卫文公的政绩,那么卫国能兴盛的如此迅速还有什么诀窍?人才。